

美日韩“延伸威慑”升级 与东北亚战略稳定^[1]

刘成荫 苏晓晖

【内容提要】近年来，美国在东北亚的“延伸威慑”战略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型升级。以美韩《华盛顿宣言》、美日《延伸威慑指针》及美日韩合作机制化为标志，同盟的核威慑正由传统的“战略性安抚”与“惩罚性威慑”向机制化、实战化的“拒止性威慑”及“常核一体化”方向升级。尽管这一系列“前沿化”与机制化安排在短期内提升了日韩的决策参与感，缓解了其战略安全焦虑，但难以缓解联盟困境，且排他性的威慑升级与“常核一体化”战术模糊了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的界限，导致“威慑阶梯”断裂，不仅加剧了地区军备竞赛，严重削弱危机稳定性，更推升了日韩“自主拥核”的“核多米诺”潜在风险。事实证明，单纯依靠武力拒止和极限施压无法消解东北亚安全困境。重构地区战略关系稳定，须摒弃阵营对抗思维，基于历史经验重建“行动对行动”的多边主义对话框架，并在大国间构建具有韧性的“战略稳定护栏”，从而推动东北亚地区逐渐摆脱螺旋上升的安全困境。

【关键词】延伸威慑 核保护伞 核不扩散 战略稳定 美日韩合作

【作者简介】刘成荫，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苏晓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6) 03-0080-25

[1] 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冷战结束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始终呈现出高度的脆弱性与复杂性。近年来，随着大国战略博弈加剧及朝鲜核导能力的持续发展，美国东北亚的同盟安全战略正在发生自冷战后最为深刻的转型，美国对日韩的“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承诺从传统的“战略性安抚”与“惩罚性威慑”，向机制化、实战化的“拒止性威慑”及“常核一体化”方向演进。

这一转型并非零散政策调整，而是系统性重构：美韩通过《华盛顿宣言》建立核磋商小组（NCG），将战略核潜艇常态化部署、核资产信息共享与联合核作战规划写入双边议程；美日将延续十余年的延伸威慑对话（EDD）抬升至部长级，并出台首份正式成文的《延伸威慑指针》，赋予日本在同盟核决策中的有限话语权；美日韩则以戴维营峰会为起点，签署《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备忘录》（TSCF），将高层磋商、“自由之刃”多域联演固化为常设机制。这些举措共同推动延伸威慑从“模糊政治承诺”下沉为“可执行作战框架”，核与常规力量的边界在同盟运作中被深度模糊。

这种升级在短期内虽然缓解了日韩的安全焦虑，但其对地区安全的深层影响不容忽视。当核磋商、常规支援与前沿部署被绑入同一套常态化系统，危机中的误判与冲突升级风险将被显著推高，地区军备竞赛或将陷入螺旋式升级的恶性循环，日韩“自主拥核”的“核多米诺”效应也将被加速诱发。三者叠加，无疑将把东北亚推向一个更严重的安全困境。本文旨在剖析美日韩延伸威慑的最新动向，评估其对地区安全架构的冲击，并探索重构战略关系稳定的可能路径，为超越阵营对抗、实现共同安全提供参考思路。

一、延伸威慑的内涵与美国在东北亚延伸威慑战略的沿革

（一）延伸威慑的概念界定

延伸威慑是威慑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指军事强国或核大国向其盟友及伙伴国作出的安全承诺，即以包括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在内的自身军事能力为后盾，威胁对潜在攻击者实施报复，从而阻止后者对受保护方发动武装攻击。它与为保护本国领土的直接威慑相对应，是大国联盟体系中安

全保障的核心机制，常被形象地称为“核保护伞”。根据美国军方文件，延伸威慑不仅是美国的安全承诺，更旨在消除盟友自主研发核武库的必要性，因而兼具防扩散功能。^[1]

延伸威慑作为一项核战略安排，与区域战略稳定密切相关。二战后，核武器的出现及其革命性影响催生了“战略稳定”概念：当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使战争成本变得极其高昂，国家间便会避免发动核战争。在美苏两大阵营长期对抗中，美国战略界提出了“恐怖核平衡”概念，揭示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心逻辑——当两个拥核大国均具备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任何先发制人核攻击都将招致自身无法承受的报复，这种“同归于尽”的前景反而成为遏制核战争爆发的关键机制。^[2]1960年8月，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首次对“战略稳定”作出官方界定，将其定义为免于突然核袭击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实现，有赖于双方均拥有可信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且彼此的反击力量处于相互脆弱的状态。^[3]这一界定明确了“战略稳定”的核心要素有三：目标是避免核战争，实现途径是军备控制与透明度建设，物质基础是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打击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战略稳定”的讨论涵盖两个层次：狭义指1960年该界定下、以相互确保摧毁为基础的经典战略稳定概念，评估时沿用“危机稳定性+军备竞赛稳定性”二维框架^[4]；广义则指东北亚地区安全

[1] U.S. Air Force, *Air Force Doctrine Publication 3-72: Nuclear Operations*, August 4, 2025.

[2]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中提出“相互恐惧核突袭”理论，为战略稳定概念奠定了博弈论基础。

[3]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Report on Nuclear Deterrence and Arms Control,"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ugust 1960, p.17.

[4] 战略稳定包含两个核心维度：一是危机稳定性，指危机中双方因对方拥有可信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而无先发制人动机，任何第一击都将招致无法接受的报复；二是军备竞赛稳定性，指双方均无动力大规模扩充军备或改变力量结构，因这类改变要么被对等回应抵消，要么无法带来实质性安全收益。参见 Thomas C. Schelling, Morton H. Halperin, *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1, pp.37-42.

架构的整体稳健性，含核不扩散、大国战略关系态势、半岛僵局等外层变量。

（二）冷战期间：从“核保护伞”的确立到防扩散的“战略安抚”

冷战期间，美国在东北亚的“延伸威慑”战略经历了从最初的同盟承诺到“大规模报复”下的核保护伞构建，再到防止核扩散危机及冷战后期的前沿威慑强化的演变过程。与欧洲高度机制化的北约多边体系不同，美国在东北亚的延伸威慑建立在双边“轮辐体系”基础之上，其战略意图不仅在于威慑所谓“苏联、中国和朝鲜的共产主义扩张”，也包含防止日韩等盟友自主发展核武器的“双重遏制”逻辑。

美国在东北亚延伸威慑的起点，源于朝鲜战争的爆发。1950年初，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的“防御圈”讲话未将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明确纳入其中，被认为间接引发了朝鲜战争。^[1]战后，美国意识到必须通过明确的法律承诺来展示战略清晰度。在此背景下，美国相继与日本（1951年）、韩国（1953年）及台湾当局（1954年）签订了双边安全条约。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NSC162/2号文件，确立了“新面貌”（New Look）战略，强调以不对称的“大规模报复”来应对常规威胁。^[2]这一文件标志着核武器成为美国向东北亚盟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核心支柱，“核保护伞”概念初步成型。此时的延伸威慑主要表现为美国以压倒性的战略核优势为后盾，弥补盟国在常规军力上的劣势。

进入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放弃了僵化的“大规模报复”，转向“灵活反应”战略。1964年10月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极大改变了东北亚的战略平衡，日本和韩国产生了强烈的安全焦虑，两国国内甚至一度出现自主拥核的讨论。为了防止盟友走向核武装，美国明确并强化了其延伸威慑承诺。1964年10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公开声明，明确宣布“对于那些不谋求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

[1] Dean Acheson, “Crisis in Asia - An Examination of U.S. Policy,”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22, No. 551, pp.111-118.

[2]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162/2: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ume II: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Part 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p.577-597.

果其面临核威胁，美国将提供强有力的支持”。^[1]这是美国在冷战历史上首次以公开的官方声明形式，针对特定事件向亚洲盟友作出明确的延伸核威慑承诺。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也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谈判和缔结阶段，美国不得不反复重申将“核保护伞”覆盖欧亚盟友的延伸威慑政策，以换取盟国承诺不研发核武器。这一时期，延伸威慑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打消盟友自主拥核的动机，其内涵也从单纯的“威慑对手”扩展到了“安抚盟友”和“防止核扩散”。

与此同时，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与国内经济的持续疲软，迫使美国不得不收缩其在亚洲的战略布局。1969年，时任总统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提出著名的“尼克松主义”，划定了分层威慑结构：一方面，要求亚洲盟友在常规防御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美国将继续履行条约义务，并“为盟国或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核保护伞”。^[2]这意味着，20世纪70年代的东北亚延伸威慑演变为“盟国主导常规防御+美国提供核威慑后盾”的责任分担模式。1978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签署，进一步将这种分工在政策层面固化下来。

冷战后期，面对苏联在远东地区大规模部署SS-20中程弹道导弹与“逆火”式轰炸机，美国认为其在东北亚的延伸威慑可信度受到了严重挑战。为此，里根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其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强调，必须在太平洋地区恢复足以威慑苏联的军力态势。^[3]在具体行动上，美国一方面扩大了美韩“协作精神”联合军演的规模，另一方面于1986年推出美国官方首份较为系统完整的《海上战略》报告，提出了将海上力量前推至对手近海、加强前沿部署的进攻性战略思想。^[4]据此，美军将已列装并搭

[1] Lyndon B. Johnson,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Chinese Nuclear Weapon Test,"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 1963-64,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5, pp.1377-1378.

[2] Richard Nixon,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A New Strategy for Peace*, February 18, 197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pp.55-56.

[3] Caspar W. Weinberger,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iscal Year 198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83, pp.19-21, pp.230-232.

[4]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The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MD: U.S. Naval Institute, 1986.

载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TLAM-N）纳入战备与演习序列，并以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和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为主要平台，作为在北大西洋和西太平洋等地区对苏威慑的实战化抓手。这一部署将战区战术核力量与常规前沿威慑紧密结合，显著提升了美国对苏威慑的实战可信度。东北亚的延伸威慑由此从单纯的战略核报复，升级为具备战区灵活打击能力的综合威慑体系，也为冷战后美日、美韩同盟的威慑架构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美国在韩国部署的陆基战术核武器也在持续积累。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起，美国陆续在韩国部署了多种战术核武器，包括短程弹道导弹（MGM-52 “长矛”）、核炮弹（M110）、核地雷（MADM）等，高峰时期数量曾达近千枚。^[1]另外，根据上世纪 60 年代末的所谓美日“冲绳核密约”，美国在冲绳最多时储备有 120 枚以上的核弹头。^[2]这些前沿部署的战术核武器构成了美国在东北亚延伸威慑的“最后一层保险”，也是冷战时期“灵活反应”战略在东北亚的重要物质基础。

（三）冷战结束后：从“战术核撤出”到“定制威慑”，再到“一体化威慑”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与地区安全环境的剧变，美国在东北亚的延伸威慑战略经历了一轮深层转型，其驱动逻辑从防范大规模入侵，切换为应对朝鲜核武化及大国战略竞争。

在冷战结束前夕的 1991 年 9 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宣布“总统核倡议”，决定从海外撤出全部前沿部署的陆基和海基战术核武器，标志着美国开始降低对战术核武器的直接依赖。^[3]此后，维系对日韩安全承诺的重担，转

[1] 参见雷炎：《从“前沿部署”到“远程投送”——美国对朝核威慑绵延 60 载》，载《青年参考》2013 年 2 月 27 日，第 18 版。

[2] 参见《日媒揭秘：美国当年为何在钓鱼岛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新华网，2013 年 8 月 13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08/13/c_125159087_2.htm。

[3] George H.W. Bush,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Reducing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Nuclear Weapons,” September 27, 1991,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H.W. Bush, 199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p.1224-1227.

由美国本土战略核力量与在海湾战争中名声大噪的高科技常规打击能力共同承接，美国在东北亚的延伸核威慑战略也从“在岸型”转变为“离岸型”。1992至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期间，克林顿政府陆续将美军最先进的常规武器平台配置到韩国及周边，做好了随时对朝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准备，但并未公开和正式威胁使用延伸威慑。

进入21世纪，小布什政府一上台即宣布朝鲜为“邪恶轴心”国家，甚至威胁对朝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之后朝鲜核导能力的持续发展与美国对朝政策的日趋强硬相互交织，使得东北亚安全环境再度绷紧。2002年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小布什政府以轮换部署和临时派遣的方式在朝鲜半岛及周边展示美国“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以提高战略资产的可视性，彰显美国向韩国提供核保护的意志。2006年朝鲜首次核试验后，小布什政府迅速且高调地向日韩重申了“核保护伞”承诺。同年，美国国防部发布《四年防务审查报告》(QDR)，正式抛出“定制威慑”(Tailored Deterrence)概念。^[1]该战略强调针对不同对手的特定心理、战略文化和能力特征，量身设计威慑方案——意味着延伸威慑从此告别冷战时期面对苏联的“一刀切”模式，转向精细化与差异化。

奥巴马执政时期，一方面提出“无核世界”倡议，并宣布美国将严格限制核武器的使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另一方面又批准核武库更新计划，并将“定制威慑”战略在东北亚进一步深化与机制化对接。2010年发布的《核态势评估》(NPR)报告明确提出，要在东北亚构建“地区威慑架构”，旨在加强与日韩的同盟磋商机制。^[2]随后，美韩正式成立“延伸威慑战略与磋商机制”(EDSCG)，美日也将双边延伸威慑对话进一步做实——“核保护伞”由此在政治和军事两个层面都被推向高度机制化的轨道。

特朗普第一任期未在东北亚延伸威慑的机制层面作出进一步升级。面对朝核能力的第二次跃升，特朗普放弃了奥巴马时期的“战略耐心”，转

[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6, 2006, pp. 49–50.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April 2010, pp.31–33.

向“极限施压”与首脑峰会并行的对朝路线，延伸威慑方针则基本维持在奥巴马政府建立的 EDSCG/EDD 框架内。此外，第一届特朗普政府 2018 年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作出了两项重要调整：一是在战略核潜艇“三叉戟”D5 导弹上增设低当量核弹头（W76-2），意在填补“高当量战略核武”与“常规打击”之间的升级缝隙，使对手难以借“美国不敢率先使用核武器”进行升级讹诈；二是启动新型海基核巡航导弹（SLCM-N）项目，对“战斧”进行核版本改进，旨在使同一舰艇平台兼具常规与核打击能力，形成“常核同舰”的规划雏形。这些方案意在使美国的核威慑手段更加灵活多样，并能强化危急时刻的危机应对弹性。

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提出“一体化威慑”战略。作为覆盖亚太、欧洲、中东的全局性概念，其核心逻辑是将核威慑、陆海空常规打击、导弹防御、太空、电磁、网络等全域军事能力，辅以政治、外交、经济、科技等各种非军事手段，以及同盟体系内的跨盟友资源，整合为所谓“无缝对接式”的统一威慑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延伸威慑被赋予了新的定位，成为“一体化威慑”在盟友端的核心支柱。美国国防部 2022 年 10 月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对此进行了重新定义，强调延伸威慑不仅是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更是美国全球联盟体系的“军事重心”与核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报告强调，延伸威慑与直接威慑是美国威慑战略的两大基石，其使命是阻止潜在对手向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发动核攻击或其他战略攻击。围绕“加强区域核威慑”这一主线，报告提出根据不同地区威胁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延伸威慑措施，在亚太方向重点则落在强化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换言之，东北亚延伸威慑的升级并非孤立举措，而是“一体化威慑”战略在亚太方向的具象化落地。2023 年《华盛顿宣言》、美日《延伸威慑指针》、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备忘录》、“自由之刃”三边演习等，均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的具体部署。

为增强延伸威慑的可信度与有效性，2022 年版 NPR 还进一步列出了实施手段与能力建设的路线图。作为“一体化威慑”的基石，核威慑承担“底线威慑”功能，它不以频繁使用为目标，而是通过战略核力量的现代化与多

样化打击选项，确保对手在任何升级阶梯上都能感知到“不可接受的代价”，从而为常规、网电、太空等非核能力的运用提供战略保障。核力量层面，美国将继续推进由战略核潜艇、隐形战略轰炸机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构成的“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现代化，并维持从战略核武器到低当量核武器的多样化打击选项，以确保灵活、可信的报复能力。前沿部署层面，美国将在欧洲、亚太等关键地区保持战略轰炸机、“双能力战机”（DCA）^[1]及相关核力量的存在，以此向盟友传递清晰的安全承诺信号。与此同时，美国还将深化与盟友的延伸威慑磋商机制，通过定期对话、联合演习、信息共享等方式提升同盟内部的协调水平，并将核威慑与常规打击、导弹防御、太空安全、网络安全等非核战略能力进行整合，构建“常核一体化”（CNI）威慑体系，以此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确保对盟友及伙伴的延伸威慑稳定可靠。^[2]

二、近年美日韩延伸威慑升级的最新进展

自2023年以来，以美韩《华盛顿宣言》为标志，美国在东北亚的延伸威慑战略经历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一轮升级，除以实际政策行动强化对日韩的延伸威慑承诺外，美日韩三边军事安全合作亦同步深化，逐步构建起阵营化的常核一体威慑联动机制。

（一）美韩同盟：从“战略承诺”向“常核一体化”的机制化升级

2022年韩国尹锡悦政府执政后，面对朝鲜核导能力的持续提升及韩国内要求强化安全保障的呼声高涨，美韩同盟的延伸威慑叙事从文在寅时期相对克制的基调，转向更强调“机制化+可视化”的威慑轨道。2022年5月，拜登访韩期间重申对韩延伸威慑承诺，强调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

[1] “双能力战机”是指经核认证、既可执行常规打击任务又可挂载并发射/投放战术核武器的作战飞机，如F-15E、F-16及经北约核共享认证的F-35A等。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 Nuclear Posture Review Fact Sheet: U.S. Extended Deterrence*, October 27, 2022.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Oct/27/2003103941/-1/-1/1/EXTENDED-DETERRENCE-NPR-FACTSHEET.PDF>.

的全部军事能力”。双方宣布尽快重启高级别“延伸威慑战略与磋商小组”机制^[1]，旨在强化美韩两国在对朝核威慑领域的政策协调、信息共享与行动协同。同年9月16日，第三届EDSCG会议在华盛顿举行，这是该机制重启后的首次高级别实质性会议，双方明确将EDSCG机制常态化运行。

2023年4月，尹锡悦访美并与拜登正式签署《华盛顿宣言》，使其成为美韩延伸威慑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宣言核心内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建立美韩核磋商小组，作为双边核政策协调与决策沟通的常设机构；二是美方承诺战略核潜艇在朝鲜半岛周边恢复常态化部署，这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首次；三是扩大美国核资产相关信息的共享范围，进一步强化韩方对美国核威慑能力的认知与“信心”；四是强调“任何针对韩国的核攻击都将导致发起攻击的政权终结”，以彰显美国对韩提供核保护伞的“坚定决心”与“压倒性”反制姿态。^[2]同年7月，核磋商小组首次会议在首尔举行，由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级官员与韩国国防部次官共同主持，两国国防、外交、国安等部门代表参会。会议重点讨论了核信息共享、协商机制完善与联合规划程序搭建等核心议题，标志着核磋商小组机制正式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成为落实《华盛顿宣言》、深化延伸威慑合作的核心平台。

在战略资产前沿部署方面，2023年7月，美国战略核潜艇“肯塔基”号停靠韩国釜山海军基地，这是美国战略核潜艇时隔42年再度停靠韩国。同年10月，美国B-52H战略轰炸机首次在韩国清州空军基地着陆，期间与韩国F-35A战机开展联合空中演习，并在首尔航空展上公开展示。在联合演训方面，2023年8月，美韩举行“乙支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此次演习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涉核威慑与核危机应对要素，将核使用情景融入指挥所推演与政府应急体系演练，重点检验韩国政府各部门在核危机条件下的民事防护与应急管理能力、对前线作战的支援能力，以及美韩两

[1] Republic of Kore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OK - U.S.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May 21, 2022, https://www.mofa.go.kr/eng/brd/m_5476/view.do?seq=319612.

[2]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eclaration,” April 26, 202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4/26/washington-declaration-2/>.

军的联合指挥与协同响应机制。^[1]

2024年,美韩延伸威慑合作的重点转向机制细化与执行落地,核心成果是《朝鲜半岛核威慑与核作战指南》的签署,推动延伸威慑从政治宣示层面下沉至可执行的军事行动规划层面。当年7月,尹锡悦与拜登在北约峰会期间正式签署该指南,其核心突破有三:一是明确韩国常规军力对美国核作战的支援计划与具体执行流程,实现核常力量的深度整合;二是建立核威慑与核作战的联合决策机制,缩短危机情况下的沟通链路,提升响应速度;三是细化核磋商小组机制的运作规则,使韩国作为无核国家能够深度参与美国核作战规划,显著提升韩方在核威慑决策中的知情权与参与权。韩国国家安保室时任第一次长金泰孝称,韩美之间明文规定美国核武将执行朝核威慑和应对相关任务尚属首次,这意味着韩美同盟的基础从常规武器升级到核武器。^[2]

此后,美韩依托核磋商小组机制不断深化军事协作,开展多层次联合演训,强化常规与核力量一体化作战能力,以提升对朝延伸威慑效能。其中代号“钉锤”的美韩核作战演习为核心涉核演训项目,2024年以来已举行三次,均以模拟针对朝鲜的核打击方案为核心,开展核作战预案兵棋推演。期间,核磋商小组于2025年1月、12月分别召开第四次、第五次会议,评估包括“钉锤”军演在内的演训成效、明确后续合作方向。双方还多次组织跨部门桌面模拟推演与兵棋推演,强化核危机决策及应急规划能力。2025年11月,美军“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驶入韩国周边;12月,美军攻击型核潜艇抵韩部署;同期,美军B-52H、B-1B等战略轰炸机亦多次飞临半岛周边开展联合巡航,以可视化方式强化威慑。“乙支自由护盾”年度联合演习则融入涉核训练内容,与“钉锤”军演相互配合,通过模拟推演、实弹训练等课目检验核威慑运用及协同作战能力。此外,

[1] 参见 United States Forces Korea,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United States announce exercise Ulchi Freedom Shield 23,” August 13, 2023, <https://www.usfk.mil/Media/Press-Products/Press-Releases/Article/3491557/the-republic-of-korea-and-united-states-announce-exercise-ulchi-freedom-shield/>。

[2] 《韩美首脑发表韩半岛核威慑核作战指南》,韩联社中文网,2024年7月12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240712000400881>。

双方还完善“常核一体化”作战框架，明确韩国在核应急行动中承担情报支援、常规打击、后勤保障等任务，并搭建专用安全通信系统、扩大敏感核信息共享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华盛顿宣言》的签署标志着美韩延伸威慑合作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但该宣言并非“核共享”协议——美国始终保留核武器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未向韩国转移任何核相关部署权或控制权，甚至在拜登政府卸任前夕的2025年1月初，美国能源部仍将韩国列入“敏感国家及其他指定国家名单”，对韩国接触美国核能等尖端技术维持严格审查与背景核查。这说明《华盛顿宣言》的“升级”并未解除美对韩核材料层面的制度性封印，美对韩的“核管束”与“核安抚”始终在同步运行。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韩“核管束”与“核安抚”的底色出现了新变化：美国在核材料、核技术层面对韩管束出现局部松动，更倾向于将核相关议题纳入“盟友付费+分担印太防务”的交易框架。2025年10月特朗普访韩期间与李在明会晤后，美方原则上同意支持韩国建造核动力攻击型潜艇（SSN），并启动燃料供应等后续安排讨论。这是2021年美国通过“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框架对澳大利亚放行海军核动力合作后，第二次对无核盟友松口。与之配套，美韩围绕《韩美原子能协定》修订的博弈也被纳入交易轨道：拜登政府时期被国务院防扩散局长期搁置的“铀浓缩/后处理”议题，在特朗普任内有望获得更高政治能见度。

需说明的是，美方此轮松动仍局限于“海军核动力”这一防扩散灰色地带，未突破《华盛顿宣言》设定的核武层面底线，仍受到美国国内防扩散官僚体系、国际原子能机构“海军动力豁免”监管规则的制约，但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将核材料议题“交易化”的处理方式，已与拜登政府时期“制度性管束优先”的思路形成一定反差，折射出“常核一体化”战略在特朗普2.0版本下，对东北亚防扩散规范的进一步侵蚀。

（二）美日同盟：部长级磋商与《延伸威慑指针》的落地

自拜登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经历了冷战后最为深刻的战略转型，延伸威慑亦得到全面强化与机制化升级。2021年4月，拜登与时任日本首

相菅义伟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重申《美日安保条约》对日本安全保障的承诺，并强调美国在必要时将使用包括核能力在内的全部力量支持日本防卫。^[1]

2023年1月，美日举行“2+2”会议，将延伸威慑作为核心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决定进一步加强双边各级对话，包括通过延伸威慑对话机制，并强调要提升威慑的可信度和有效性。^[2]2024年4月，拜登与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晤，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要求双方外长和防长在下一次“2+2”会议期间就延伸威慑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同年6月，美日在部署有150枚“民兵-3”洲际导弹的怀俄明州沃伦空军基地举行延伸威慑对话会议，这是双方首次在核力量部署现场就延伸威慑议题进行磋商。^[3]同年7月，在东京举行的美日“2+2”会议期间，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 III）与时任日本外务大臣上川阳子、防卫大臣木原稔举行首次美日延伸威慑部长级磋商，标志着美日延伸威慑对话从2010年建立的事务级机制正式提升至部长级。^[4]奥斯汀在磋商后表示，延伸威慑是美日同盟的核心，此次会议是深化战略协调、确保威慑力强大且可信的重要一步。双方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确认，美国将进一步强化对日本的延伸威慑承诺，以遏止对手可能对日本进行的核打击及其他形式的攻击，同时强调日本防卫能力的提升将为美国延伸威慑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1]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U.S. - 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S. - 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April 16, 2021,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77718.pdf>.

[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U.S.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Japan-U.S. '2+2')," January 11, 2023, https://www.mofa.go.jp/na/st/page4e_001338.html.

[3] F.E. Warren AFB, "90 MW hosts U.S. Extended Deterrence Dialogue," June 26, 2024, <https://www.warren.af.mil/News/Article/3818032/90-mw-hosts-us-extended-deterrence-dialogue/>.

[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July 28, 2024,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704433.pdf>.

2024年12月，美日两国政府正式发布《延伸威慑指针》。这是两国自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签订以来首次制定专门针对延伸威慑的官方指导文件。该指针旨在“强化同盟现有与延伸威慑相关的磋商和沟通程序，解决战略信息传递以最大化威慑效果，并提升美国延伸威慑措施的有效性，同时借助日本防卫能力的支撑”。尽管双方未公开指针的全部细节，但根据美国国防部和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官方声明，该文件至少包含三个核心维度：一是强化磋商机制，明确从日常沟通到危机状态下美日双方在延伸威慑问题上的协调流程；二是战略信息传递，旨在通过清晰、一致的信号向潜在对手传递威慑决心；三是能力整合路径，强调美国延伸威慑与日本防卫能力的互补性。此外，据日媒报道，该指针中还明确包含了“日美两国将通过日本自卫队的同盟协调机制，就美国核武器的使用进行沟通”的条款。^[1]这意味着日本在同盟核威慑决策中获得了有限但实质性的话语权，突破了长期以来在核威慑方面“美主日从”的格局。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日同盟在常核威慑协同性与前沿部署层面继续推进。2025年4月，美军B-1B战略轰炸机首次在日本三泽基地进行常态化部署，并开展联合训练，标志着美国战略打击力量在东北亚的前沿存在显著增强。同年6—7月，美日延伸威慑对话在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所在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举行，双方首次深入讨论美军使用核武器的具体情境，并进行桌面推演，日方人员还参观了该基地的B-52战略轰炸机。^[2]这一举措是对美日《延伸威慑指针》的实操化推进。同年9月，在“坚毅之龙25”联合军演中，美军首次在日本部署“堤丰”(Typhon)中程导弹系统。此外，美日加速导弹防御系统合作，包括提升日本“标准-3”导弹产能，联合生产“爱国者-3”导弹，以构建多层次反导网络，进一步完善延伸威慑的防御维度。

[1] 読売新聞：米国の核使用、「日本と意思疎通」初めて明文化…北朝鮮と中国念頭に「核の傘」強化、2024年12月29日、<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41228-OYT1T50163/>。

[2] “Japan, U.S. discuss deterrence strategies,” *Sentry*, June 21, 2025, <https://sentry-magazine.com/japan-u-s-discuss-deterrence-strategies/>。

（三）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升级与“自由之刃”多域实战演习

如果说双边机制是延伸威慑的“承重墙”，那么美日韩三边合作则是美国重塑东北亚威慑架构的“连廊”。2023年8月戴维营峰会后，三边安全合作突破了历史恩怨的羁绊，呈现出高度机制化与实战化的特征。其进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数据共享到政策协调的机制化。2023年12月，美日韩正式启动朝鲜导弹预警数据的实时共享机制^[1]；2024年7月，三方防长签署《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备忘录》，将高层防务磋商、联合参谋长会议及多域演习制度化，为三国在核导危机情境下的联合威慑评估与情报融合提供制度保障。^[2]二是“自由之刃”等多域实战演习的常态化。在实战化层面，美日韩联合军演实现了从单一课目向多域联合作战的跨越。最为典型的是2024年6月首次启动并于2024年11月和2025年9月再度举行后转入常态化的“自由之刃”三方多域演习。该演习横跨海、空、水下及网络等领域，并有美国核动力航母打击群等核心战略资产深度参与。此类高强度演习意在提升三方在复杂电磁与核生化环境下的联合拒止能力，并向潜在对手展示三方在“危机响应”上的协同能力。

总之，2023年以来，美日韩在东北亚的延伸威慑已从传统的“被动核保护伞”形态，演变为“主动拒止”与“常核一体化”并重的综合威慑架构。

三、美日韩延伸威慑升级的影响评估

回溯70余年的演进轨迹，一条逻辑主线清晰可辨：美国在东北亚的延伸威慑，从“惩罚性威慑”向“拒止性威慑”缓慢转型。冷战初期，“大规模报复”的逻辑是“你打我盟友，我就打你本土”，这是一种事后惩罚的承诺，

[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Japan–Republic of Korea Trilateral Ministerial Joint Press Statement,” December 19,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621235/>.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pan–United States–Republic of Korea Trilateral Ministerial Joint Press Statement,” July 27, 2024,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852146/>.

其可信度完全系于对手相信美国愿意为盟友承受核报复风险。之后，随着苏联战区核力量的崛起、朝鲜核导能力的突破，以及美国常规精确打击能力的成熟，单纯依赖事后惩罚愈显可信度不高。于是，前沿部署战术核武器、构建导弹防御体系、将盟友常规力量嵌入核作战规划——这些动作的共同指向，是在惩罚之外叠加一层拒止，让对手认识到，即便发动攻击也无法达成目标。这一逻辑的转换是驱动美日韩延伸威慑升级的根本内因。

2023年以来，美日韩在延伸威慑领域的全方位升级，本质上是美国主导下、以重建“核威慑可信度”为核心目标的对同盟的政治安抚与军事支撑行动。短期看，这套组合拳在政治心理与军事部署两个维度均有所获。在战略安抚层面，“延伸威慑战略与磋商机制”与核磋商小组等制度化磋商机制的建立，以及《华盛顿宣言》《延伸威慑指针》等文件的签署，在制度层面赋予了日韩某种程度的“参与感”与“知情权”。战略核潜艇、B-52H轰炸机等战略资产在半岛周边的定期部署，则通过承担高昂部署成本的方式向盟友传递了可信的安全信号。在拒止效能层面，美日韩以“自由之刃”等多域联合演习为抓手，在高频次的协同训练中显著提升了三方军队的互操作性。这种基于实战化协同能力的“拒止性威慑”，与冷战时期单纯依赖核报复的“惩罚性威慑”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要让对手认识到进攻无法达成目标，后者是威胁让对手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轮升级在战术层面确实推动了延伸威慑从“口号”向“能力”的转化。然而，这种能力的提升是有其限度的。

（一）联盟困境：延伸威慑无法通过机制化升级消解自身结构性缺陷

这套架构的内生性局限根植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经典的“联盟困境”，并在当前东北亚安全格局的催化下被急剧放大。

1. “牵连”与“抛弃”的战略两难。延伸威慑的提供者在履行安全承诺时，始终在“牵连”（Entrapment）与“抛弃”（Abandonment）之间走钢丝。一方面，庇护国为了降低被盟友拖入非核心利益冲突的风险，倾向于保持承诺的策略性模糊；但这种模糊必然会削弱盟友对保护承诺的信任，催生被“抛弃”的恐惧，进而动摇同盟根基。另一方面，若对盟友过度明确安全承诺、强化

自动介入机制，庇护国则会丧失战略自主性，显著提升被卷入冲突的风险。^[1]这种因国家利益不完全一致而产生的信任赤字，是延伸威慑难以调和的结构矛盾。正如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所展现的逻辑，延伸威慑在依托美国核优势的同时，也承担着“安抚”盟友的功能，其重要功能之一，正是通过安全承诺约束盟友的独立拥核冲动，从而抑制潜在的核扩散趋势。^[2]

2. 核心城市的置换难题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干扰。在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威慑理论框架下，延伸威慑面临着一个经典的“置换难题”：用“洛杉矶的安全”换取“首尔或东京的安全”。^[3]随着朝鲜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的成熟，尤其是固体燃料推进和多弹头技术取得突破，其在理论上已具备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这意味着美国延伸威慑承诺的实质，已经演变为“以本土城市被毁的风险换取盟友安全”——在任何理性的决策者眼中，为小国利益牺牲大国的绝对安全都难以自洽。此外，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逻辑的脆弱性。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随着“美国优先”所代表的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思潮的回归，美国对外政策表现出明显的摇摆性。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在防务与安全关系上可能采取的“交易式”和“防务负担向盟友转移”的处理方式，正在侵蚀美国数十年来积累的安全承诺信誉。在日韩看来，面对朝鲜清晰且具体的“核威胁”，美国战略威慑中固有的“模糊性”更容易被解读为承诺的不可靠。

3. “常核一体化”导致的威慑阶梯断裂。现代延伸威慑在战术上推崇“常核一体化”，这一理念与美国拜登政府时期推行的“一体化威慑”战略高度契合，其本身是一把双刃剑。该策略在理论上能够打破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的割裂，增强军事回应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提升威慑的整体效能。但在实

[1] 参见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36, No. 4, 1984, pp.467-468。

[2] 参见 Lawrence Freedman and Jeffrey Michaels,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4th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189-192。

[3] Victor D. Cha, “The Logic of Extended Deterrence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3, Winter 1999 - 2000, pp.41 - 68.

践中，它会模糊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之间的“防火线”（firebreak）这一核战略领域的关键界限，最终可能会导致“威慑阶梯”（Escalation Ladder）的断裂。“威慑阶梯”理论认为，冲突升级应遵循可识别的阶梯式路径^[1]，核与常规力量使用之间的清晰界限是维持危机稳定的重要基础。而常核一体化恰恰破坏了这一界限：当常规冲突与核威慑被深度绑定，对手极有可能在冲突早期陷入“不先动手就会失去核武器”（Use it or lose it）的恐慌，从而催生“先发制人”的决策冲动。当恐惧压倒理性克制，先发制人便不再是选项，而会成为本能。这正是威慑理论中最危险的“先发制人不稳定”陷阱，它从根本上掏空了危机时期保持克制的战略基础。

（二）信任赤字：延伸威慑升级加速“核多米诺”风险

近年来，在朝鲜核导能力持续提升的背景下，日韩两国对美国核保护伞可信度的疑虑不断累积，其国内关于“自主拥核”的探讨已从学术边缘进入政策视野。尽管短期内日韩自主拥核仍缺乏现实可行性，但其核潜能不容小觑。一旦美国的延伸威慑承诺出现松动，在特定国内外政治条件的催化下，日韩的拥核冲动可能会加速释放，在东北亚形成“核多米诺”连锁反应，对区域战略稳定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深刻冲击。^[2]

1. 韩国的拥核民意上升与“核门槛能力”建设。近年来，韩国国内自主拥核的呼声持续走高。峨山政策研究院 2025 年 4 月民调显示，支持韩国拥核的民众比例已达 76.2%，创下 2010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3] 这种强大的民意基础使得拥核选项已不再是边缘议题，而是成为保守派政治人物的主流议题，并对进步派政府形成倒逼之势。

[1] 参见 Herman Kahn, *On Escalation: Metaphors and Scenario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65。

[2] Nicholas L. Miller, “Nuclear Dominoes: A Self-Defeating Prophecy?” *Security Studies* 23, No. 2, 2014, p.226.

[3] 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South Koreans and Their Neighbors 2025” Record 76.2% Public Support for Nuclear Armament,” April 28, 2025, https://www.asaninst.org/bbs/board.php?bo_table=s3_4_2_eng&wr_id=92.

作为进步派，李在明就任韩国总统后对“核武装论”持明确否定立场。2025年12月，他在国务会议上公开批驳拥核“不切实际、不负责任”，强调此举将触发国际制裁、冲击韩美同盟、损害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并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1]但其政策核心并非放弃核能力储备，而是转向可控的核门槛技术与战略投送能力，把核门槛能力做厚做实。

首先是核燃料制度的突围。李在明政府全力推动《韩美原子能协定》修订，成立“韩美原子能协定修订特别工作组”，直接攻略白宫核心幕僚，谋求扩大铀浓缩与乏燃料后处理的更大自主权限，试图压缩核材料“武器化爆发时间”。而保守派则主张对标日本，争取完整后处理能力的呼声持续高涨。

其次是核动力潜艇的突破。李在明政府抓住特朗普第二任期“交易型外交”的窗口期，成功撬动了美方对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的原则性放行；美方承诺提供核动力相关技术与燃料支援。作为回报，韩方以韩华海洋收购美国费城造船厂为筹码，承诺向长期萎缩的美国造船业注入资金与技术，将核潜艇议题包装为“分担印太反潜、重振美国制造”的交易案。2026年5月，韩国国防部出台《核动力潜艇开发基本规划》，明确其定位为攻击型核潜艇，并将搭载已列装的“玄武-4”潜射导弹。同时，韩方已于2026年2月启动《核潜艇项目特别法案》立法程序，拟通过立法将项目确定为长期国家战略工程，以法律形式锁定项目预算，从而降低政府轮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目前，该法案已提交韩国国会。

第三是投送载具的梯次到位。韩国是全球唯一掌握潜射弹道导弹（SLBM）技术的无核国家。其“玄武-4”陆基型与潜射型已完成批量试射与列装，射程覆盖朝鲜全境，弹体设计具备适配核弹头的载荷与制导精度能力。在此基础上，“玄武-5”重型弹道导弹（韩方称之为“怪兽导弹”）于2022年12月完成试射，其弹头重量超过8吨，破坏能力被认为与战术核武器相当，被定位为韩国型三轴体系中“大规模惩罚报

[1]《李在明就〈韩美原子能协定〉修订讨论批驳“核武装论”不切实际》，人民网，2025年12月3日，<http://korea.people.com.cn/n1/2025/1203/c407881-40616470.html>。

复作战计划”（KMPR）的核心手段。^[1]

三者叠加的结果是：韩国在法律上仍是无核国家，但核门槛已被系统性降低。民意基础、核材料权限、核潜艇平台、投送能力——四块拼图也渐次到位。一旦美国延伸威慑承诺在未来出现松动，无论是特朗普式的交易摇摆，还是半岛危机升级，韩国从“门槛”跨向“武装”的时间将被大幅压缩。这正是“核多米诺”在韩国一侧最值得警惕的变量。

2. 日本的“核禁忌”松动与“无核三原则”松绑动向。相较于韩国，日本社会受制于广岛和长崎的核爆记忆以及“无核三原则”的约束，二战后始终存在强烈的“核禁忌”。但近年来随着日本政治生态和社会思潮右倾化，反核武民意较前有所弱化。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本核政策正面临战后最激进的转向。日本媒体 2025 年 11 月的报道称，执政的自民党拟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在维持“不拥有、不制造”条款的同时，以“保障紧急状态下美国延伸威慑效能”为由，探讨调整“不运进”条款，为美军携带核武器的舰艇停靠日本港口、核装备应急前置部署预留政策空间。^[2]同年 12 月，日媒曝出负责国家安全保障事务的首相辅佐官尾上定正公开称“日本应就拥核可能性展开讨论”，打破战后不可触碰的“拥核”禁忌，在日国内引发轩然大波。2026 年 1 月，日本时事通讯社民调显示，反对日本拥核比例为 62.6%，赞成拥核比例为 16.7%，显示出日本拥核主张虽有所上升，但反对拥核仍是主流。^[3]民意层面虽仍未翻盘，但讨论空间已被打开，“拥核”从政治禁忌变为可公开讨论的政策议题，本身就是显著变化。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的核门槛硬实力。日本是全球少数拥有完整核燃料

[1] 《韩军或在国军日公开新型高威力导弹“玄武-5”》，韩联社中文网，2024 年 9 月 20 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240920001800881?section=search>。

[2] 「非核三原則」見直し、自民が検討へ 安保 3 文書の前倒し改定で議論、朝日新聞、2025 年 11 月 15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TCG4STFTCGUQIP00PM.html>。

[3] 「核保有」反対 6 割 賛成 16%、政権支持層も同調少数—時事世論調査、2026 年 1 月 15 日，<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6011500792&g=pol>。

循环能力的无核武器国家之一。根据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提交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日本分离钚库存约为44.4吨，其中约8.6吨储存在国内、约35.8吨存放于英国和法国。^[1]这一规模的核材料理论上足以支持数千枚核武器的制造。加之日本已掌握商用铀浓缩、乏燃料后处理等完整核燃料循环能力，一旦政治决策转向，其核武器化周期会短于一般无核国家。

（三）延伸威慑升级对东北亚战略关系稳定的系统性冲击

美日韩延伸威慑的升级不仅未能消除日韩的安全焦虑，其负面溢出效应反而与全球核军控体系动摇、大国核博弈激化形成共振，正在从多个维度冲击东北亚战略关系稳定。

1. 军备竞赛稳定性的丧失与“核多米诺”风险共振。美日韩的延伸威慑升级正在触发地区安全困境的螺旋升级。面对美国核威慑的强化，朝鲜以“核对核、硬碰硬”的态势作出强硬回应：政策法律层面，通过《核武力政策法》将核武地位确立为“不可逆”，引入“特定条件下可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的条款，并将核武力政策写入宪法；战略战术层面，加速推进“火星炮”系列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及潜射/水下核打击平台的研发，重点提升核力量生存性与突防能力，构建具备初步二次打击能力的实战化核反制体系。与此同时，东北亚军备竞赛正从传统的陆海空维度向太空、网络等新兴领域扩展，军备竞赛稳定性遭到进一步侵蚀。而日韩国内不断上升的拥核躁动及其“核门槛能力”建设，则与朝鲜的核力量扩张形成共振，进一步放大了这场军备竞赛的危险性。

2. “威慑阶梯”断裂与危机稳定性严重削弱。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提出的“稳定—不稳定悖论”揭示了一个核心困境：当双方在核武器层面的相互威慑看似稳固时，核战争的高昂代价反而可能使各方在常规层面的冲突中更加肆无忌惮。^[2]美日韩重点推进的“常核一体

[1] International Panel on Fissile Materials, “Civilian Plutonium Holdings Declared to the IAEA (2024),” March 2026, https://fissilematerials.org/blog/2026/03/2024_civilian_plutonium_a.html.

[2] Glenn H. Snyder, “The 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 *Strategic Review*, Vol.7, No.2, Spring 1979, pp.1–16.

化”战术，正是这一悖论在东北亚被激活的操作路径。这种做法模糊了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之间的界限，使对手在危机中难以判断冲突何时会升级到核层面，从而推高了先发制人的风险。

当前，美日韩高频度联合军演与地区国家的实弹反制相互交织，常规军事对峙的常态化正不断压低地区摩擦的阈值。在高度紧张的对峙环境下，诸如演习越界、雷达锁定一类的战术异动可能使常规对峙冲突快速滑向核对抗。若美国今后在东北亚前沿推进低当量核武器的部署，或推动核能力与常规平台的融合，将使核打击从“最后手段”变为“可选战术”，深刻颠覆冷战以来的核禁忌，进一步降低地区的核战争门槛。

3. 指挥链碎片化与同盟“牵连”带来的链式反应风险。美日韩在危机时刻的指挥协调面临一个结构性矛盾：三方政治目标与容忍底线并不完全一致，美国追求战略自主性，日韩则希望美国无条件介入。尽管相关延伸威慑与核措施机制在平时提升了指挥链的整合程度与威慑效率，但一旦危机爆发，这种深度融合反而可能放大风险。任何一方的战略冒进，都可能通过互联的指挥体系将其他两方拖入冲突，形成“链式反应”。与此同时，美日韩三国之间双边和多边机制并行运作，缺乏统一的危机指挥与管控流程，会进一步降低危机处置效率，增大风险管控的难度。

4. 全球核军控体系松动的东北亚传导冲击。从更大范围看，随着2026年2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失效，美俄间最后一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军控“护栏”消失，全球核力量约束机制进入真空期，这一冲击与美日韩延伸威慑升级形成潜在共振效应。美国可能顺势将核力量重心转向“印太”，将延伸威慑作为大国竞争的核心工具，大幅提升战略资产在东北亚的前置部署密度。而随着条约配套的现场核查、数据交换、发射通报等机制全面中断，东北亚地区恐陷入核力量“信息黑箱”，各国被迫按“最坏情况假设”制定安全决策，从而增大危机误判概率。尤其是美国在东北亚的延伸威慑战略不仅针对朝鲜，也可能会进一步寻求构建针对其他“战略竞争对手”的核优势，这些国家则不得不通过强化战略协作以对冲美日韩延伸威慑压力。如至此，东北亚恐将演变为大国核博弈的前沿，从而

使地区战略稳定面临根本性冲击。

综上所述，美日韩延伸威慑的全方位升级，叠加《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引发的全球核军控真空乃至大国核博弈，已将东北亚战略稳定推向多重风险叠加的危机临界点。美日韩以“极限施压”“排他性威慑”为核心的核战略设计，非但未能消除同盟内部的“安全赤字”，反而可能将整个东北亚拖入大国博弈升级、核军备竞赛加剧、阵营化对抗态势凸显相互交织的复合型战略深渊，其外溢效应将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与全球战略稳定根基构成深刻冲击。

四、重构东北亚战略关系稳定的可能路径

美日韩延伸威慑升级所带来的结构性风险表明，单纯依靠军事武力的压倒性展示与同盟机制的层层加码，不仅无法消解其深层的联盟困境，反而会加剧东北亚安全困境螺旋。重构东北亚战略稳定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技术层面构建更具威慑可信度的“核保护伞”，而在于理念层面的观念更新。需要跳出“以遏制求安全”的路径依赖，通过战略思维的根本性调整、多边外交经验的重新激活，以及对大国竞合新常态的灵活应对，探寻更为系统性和包容性的化解之道。

（一）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从排他性威慑转向共同安全

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破解东北亚安全困境提供了根本性的理念指引。一要致力于重塑“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共识。针对美日韩“小圈子”追求的绝对安全，应强调任何国家的延伸威慑安排不应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安全利益、朝鲜的生存安全底线。重构稳定的路径必须从“单向威慑”转向“安全平衡”，切实尊重并务实呼应各方合理的安全关切。二要推动半岛问题重回政治解决的正轨。朝鲜半岛安全困境螺旋升级的现实已经证明，单纯依靠武力拒止的核威慑不仅无法解决朝核问题，还会加剧半岛核危机风险。各方应采取理性务实态度，坚持对话协商正道。三要高度警惕日本图谋颠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及其对

地区和平稳定可能带来的严重危害性，有关各方要坚决反对日本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走“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并坚决制止日本的拥核企图。

（二）重视“六方会谈”经验：重拾多边主义与“行动对行动”原则

尽管六方会谈机制早已停摆，但其在危机管控中积累的核心遗产在当下仍具极高的经验价值。历史与现实均已表明，预设僵化前提的接触谈判缺乏现实可行性。更可行的路径是回到六方会谈“分阶段、同步走”的协商逻辑，推动“行动对行动”式的良性互动，以此止住对抗的螺旋升级，重建初步的军备竞赛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各方应积极致力于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东北亚亟需一个超越冷战式阵营体系的多边安全对话框架。在半岛问题上，可探索建立覆盖主要相关方的战略稳定对话机制，防止地区滑向“新冷战”的阵营对抗局面。

（三）应对特朗普 2.0 之变：在“交易型外交”中寻求危机管控契机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朝峰会重启的可能性成为重塑东北亚战略关系稳定的最大变量。特朗普倾向于通过领导人个人间谈判解决问题，其对美韩、美日同盟既有的机制化安排重视程度下降，甚至可能以削减美国在韩驻军作为交易筹码。这势必引发日韩新一轮“被抛弃”焦虑，但客观上也为打破当前高度紧绷的对峙僵局提供了难得的政治窗口。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美韩对于朝核问题立场的松动也预示半岛局势走向缓和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期待与金正恩会面，李在明政府提出“冻结—削减—废弃”的“三段论”及“交流—关系正常化—无核化”的“END 倡议”，都展现出一定务实姿态。如在未来的美朝领导人会谈中达成某种程度的行动克制乃至战略谅解协议，则有望在战略层面提升危机稳定性，降低因高强度对抗引发意外核战争的风险。有关各方应把握时机，积极推动促成美朝接触谈判，推动东北亚局势重回缓和轨道。

（四）强化危机管控底线：构建大国间的“战略稳定护栏”

东北亚安全困境的直接动因在于半岛分裂和朝核问题僵局，根源仍在于大国战略互信的缺失。当前，区域战略关系稳定的重构，根本上取决于大国间的危机管控和信任建设。借鉴冷战时期美苏“缓和”的历史

经验，构建“战略稳定护栏”成为当务之急。2026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是其第二任期元首外交的里程碑式互动，为波动中的中美关系提供了阶段性锚点。两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全新定位，将“旧金山愿景”中“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进一步落到“战略稳定”这一可操作议题上，为在东北亚构建“战略稳定护栏”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

构建“战略稳定护栏”的基本目的是通过制度化建设，确保大国关系在极端压力下依然具备韧性。针对东北亚海陆复合型博弈前沿的特征，构建护栏需从多个维度同步发力。首先，确保危机沟通管道的畅通。大国应秉持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的磋商原则，建立健全覆盖战区级的军事直接联络机制，并探讨建立常态化的导弹发射及大规模演习预通报制度，以提高战略透明度，从而增进信任水平，避免危险误判。其次，在海空一线对峙频发的现实下，大国间需细化海空相遇的行为准则，将无人潜航器、电子战干扰乃至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对抗纳入技术规范范畴，明确战略资产介入常规冲突的边界，严防偶发摩擦触发核升级门槛。此外，战略稳定的维持还需依赖理念维度的底线共识。大国应重新确立“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基本原则共识，遵循“预防性措施优先于管控对抗”的思路，推动地缘热点问题与大国战略博弈进行“脱钩”管理，防止局部矛盾冲突冲击全局稳定。

总之，面对东北亚错综复杂的安全形势，要将全球安全倡议的内核与地区预防性外交实践深度融合，在多边主义框架的重建、历史危机管控经验的借鉴，以及对彼此核心安全边界的切实尊重中付诸行动。惟其如此，东北亚才有望走出安全困境的螺旋，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

【收稿日期：2026-03-08】

【修回日期：2026-06-29】

（责任编辑：邢嫣）